



当代学术文丛



纷争、比较与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传承、整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实践、探索与创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  
经验、规律与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反思与启示

Reflections on Sinicization of Maxism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多维审思

黎 康/著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多维审思

Reflections on Sinicization of Maxism

黎 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审思/黎康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210 - 04928 - 9

I. ①马… II. ①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2368 号

**书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审思**

**作者:黎康**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9010**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01**

**邮编:330006**

**网址:www. jxpph. com**

**E - mail:taxue888@foxmail. com**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0. 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4928 - 9**

**赣版权登字—01—2011—222**

**定价:40. 00 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导言

## 时代中心问题的历史回应与现实解答

——“中国向何处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代<sup>①</sup>在经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sup>②</sup>和一

---

①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属于现代史；还有的认为以五四运动为界，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这段历史是中国近代史，而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本书采用的是第一种观点。

② “古今中西”问题是中国近代知识界争论的主题。冯契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就“五四”前后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等一系列的论著中，对“古今中西”作了进一步具体分析，并提炼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毛泽东对“古今中西”之争所作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次伟大的哲学革命<sup>①</sup>。“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sup>②</sup>20 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在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之中,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实现了中国化,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和完成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而且在实践中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关系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代中心问题,由此使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大事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是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呈现和把握的是民族精神的主流,中国近代哲学也同样展现了这样的致思取向。通过对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和碰撞背景下中国近代哲学逻辑演进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近代哲学的嬗变与社会的变革昭示,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逻辑与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进程则显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才能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史证明: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只有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① 冯契先生在反思和评说中国近代哲学史时这样指出:“中国近代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这次革命就在回答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从鸦片战争到 1949 年,我国第一流的思想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冯契:《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见《冯契文集》第 8 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 页。

## 一、“中国向何处去”的艰难探寻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sup>①</sup>当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中时,依旧只是个跛着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敝屣在蹒跚而行的古老中国。面对行将沦亡而自我发展道路已被无情阻隔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末途穷途,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历史第一次向中国人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核心问题。在血与泪的痛苦经历中逐渐醒悟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民主自由,他们上溯古典,下求诸野,或把深切的目光投注于西方,希冀由此制订出使中国免于沦亡和臻于富强的方案,并通过某种具体的、现实化的运动将其化为实在。于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个派别相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各自擘划着各自的社会理想、实施着各自的救世方案。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sup>②</sup>显然,作为时代精神集中体现的哲学,只有触及、回答和解决时代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才有可能承担并实现自己应有的使命。事实上,也正是出于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的需要,哲学的“历史观”和“知行观”作为方法论而在中国近代被凸显了出来。因为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所以哲学“历史观”被凸显出来;同样,因为要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解决如何把从西方学到的理论付诸中国的具体实践,由此哲学“知行观”也

---

① 著名学者胡绳认为:“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被凸显出来。纵观近代中国,“历史观”和“知行观”就成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党和各派别建构各自社会理想、指导各自政治实践的哲学依据和思想武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正是围绕着“历史观”和“知行观”这两个方面而具体展开的。

就历史观而言,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从“变易史观”—“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的逻辑发展过程。近代伊始,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1792—1841)重提“公羊三世”说,以为历史就表现为“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sup>①</sup>这样的不同层次的循环。尽管他凭借诗人的敏感提出了“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sup>②</sup>这一包含近代人文主义思想萌芽(“自我”与“创造”)的重要命题,但就总体而言,其历史观仍然是“器变而道不变”的循环论变易史观。很显然,龚自珍不可能超越不变的传统封建之“道”而指出中国的出路之所在。而以洪秀全(1814—1864)为代表所主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依据“乱极则治,暗极则光”<sup>③</sup>的变易史观,提出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sup>④</sup>的社会理想。无疑这一变易史观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但总的来说,它仍然没有超越小农经济的藩篱,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理想最终不过是违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至戊戌变法,康有为(1858—1927)把“公羊三世”说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小康”说联系起来,以

---

①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

②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③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见《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④ 洪仁玕:《资政新篇》,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90页。

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就是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sup>①</sup>的演进。这一进化史观不仅成为戊戌变法代表人物进行思想批判的武器,而且成为他们在政治上进行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他们主张历史的发展是定向的而不是循环的;强调理想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与此前的龚自珍、魏源(1794—1857)相比,显然这在观念上确是一大进步。但他们所强调的进化是“渐变”而不是“飞跃”,因而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流于改良主义。而事实上要在不触动封建国家机器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通达“大同”的理想之路,这根本是办不到的。与改良派不同,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但他们注重的是进化中的“跃进”,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认为这是浩浩荡荡的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应该说,革命派基于进化史观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有其历史理由和进步意义,但由于这一历史观把求生存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试图以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作为“历史重心”的“民生”问题,这就使其社会理想因找不到实现的现实途径和物质力量而最终流于失败。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发轫于中土的“器变而道不变”的变易史观,还是肇始于泰西的“道各不同”的进化史观;无论是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归之于“渐变”,还是将其归之于“跃进”,都没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进化,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并科学指明中国的出路之所在。而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对历史的进化规律和演进动力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也只有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指明中国未来发展的出路之所在。

与历史观相应,中国近代在知行观上也经历了一个由“知行合一”——“知行相分”——“知行统一”的逻辑发展过程。中国传统的正统派儒家一直主张

---

<sup>①</sup> “三世说”最早见于儒家今文学派的《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后历经董仲舒、何休等思想家的发展,逐渐演化成为依次发展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康有为用进化论改造儒家传统的公羊三世说,提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的新观念。

和强调的是“知行合一”观,而近代伊始,魏源则对“知行”问题作了重新考察。他大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力主“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sup>①</sup>;以为“合四十九人之智,智而尧禹”<sup>②</sup>,强调了“行”先“知”后。魏源认为,要使中华民族“倾否而之泰”,就必须“违寐而之觉”、“革虚而之实”<sup>③</sup>。尽管魏源所论“实事实功”包含有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意涵,具有近代气息,但他将发展工业、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于“在上者”,这样的“知”与“行”终因缺乏真实的承担主体,而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合一。因此,这样的知行观无法超越封建主义的窠臼,而为中国现实的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知行观上则主张“知先行后”,把“开民智”放在一切政务之首。严复(1854—1921)就说:“民智者,富强之源”<sup>④</sup>;康有为也强调:“心贵于体”<sup>⑤</sup>;谭嗣同(1865—1898)则主张“吾贵知,不贵行也。”<sup>⑥</sup>应该说,改良派所讲的“逆而强学者智”作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叛逆和抨击,具有不容忽视的革命意义。不过,由于他们片面地强调“知”而忽视“行”,这就使得以“先知者”自居的改良派只是凭主观愿望而完全脱离群众斗争的实际和现实物质力量来“改造中国”,这样的变法维新终究不过是“空言秉世”罢了。与此相反,以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以极大的革命激情强调并诠释了“行”的功用。章太炎(1869—1936)就提出“革命开民智,竞争出智慧”<sup>⑦</sup>;孙中山则进一步提出“知难行易”说,以此

① 魏源:《默觚上·学篇二》,见《魏源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② 魏源:《默觚下·治篇一》,见《魏源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叙》,见《魏源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④ 严复:《原富》,见《严复集》第一册(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⑤ 康有为:《董氏春秋学》卷六下,见《康有为学术著作选:春秋董氏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0页。

⑥ 谭嗣同:《仁学》四十八,见《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⑦ 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全集》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作为他重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依据。他们极力主张“无所谓而乐于行”，而“行”就是“顺着潮流去做”，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这就超越了前人对“行”的狭隘理解。当然，他们所言说的“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而仅仅只是局限于个人的革命活动；而且由于过分强调了“知”的艰巨性而不能正确估价“行”的作用，这也使他们与改良派一样不可能切实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之所在。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都无一例外地脱离社会实践、脱离人民群众这个“知”与“行”的主体去考察知行问题，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正确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由此也就不可能认清中国的国情以正确地指导各自的政治实践。而事实上，只有强调主观与客观、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才能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问题，从而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代的特点是在一百多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历程。”<sup>①</sup>纵观近代中国，在那饱经忧患的岁月里，无数志士仁人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希望所在。但无论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所掌握的还不是科学的思想武器，还不足以抵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蹒跚而行的古老中国，引向崭新的民族自由解放的道路。于是，在徘徊苦闷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sup>②</sup>。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播正是始于“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sup>③</sup>的苏维埃十月革命之后。“影响于未

① 《冯契文集》第7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sup>①</sup>的十月革命，确实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春雷之启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sup>②</sup>。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适应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成为中国先进分子观察国家命运、解放自己民族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sup>③</sup> 这一从中国国情的现实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不是出于哪一种政治力量或哪一个杰出人物的人为安排与随意选择，而是逻辑与历史的必然。这一选择预示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生和转机。从此，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了“中国化”的革命进程。

## 二、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关键抉择

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危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契机。然而，曾一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和流派、同其他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一起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之所以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人观察国家命运、考虑自己问题的工具，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实践性，而且还在于其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当然，马克思主义如此迅速地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及广大人民所接受与信仰，更主要的还在于其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五四”之前，中国无产阶级还羽翼未丰，而“五四”运动促使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

①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② 《瞿秋白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③ “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而列宁的理论也成为我们党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或者说，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直接的马克思主义教本。正如逢先知所指出：“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的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页。）

播的阶级基础。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滋养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79—1942)、李达(1890—1966)等,他们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完成了由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成为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一步都得经过战斗”<sup>①</sup>。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sup>②</sup>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激荡中,马克思主义日益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使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者产生了极端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和“异端邪说”,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任意残害与屠戮,对宣传新思想的进步刊物也肆意毁焚与剿禁。不仅如此,那些从思想文化统一战线中分化出来的右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所显示出的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表现出极大的忧虑与戒惧,他们从各自的利益与立场出发,妄图采取“舆论宰制”和“釜底抽薪”的办法来遏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或者公开宣扬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或者干脆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用假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来混淆视听,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或者以貌似激进的极“左”空谈——无政府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及流派之间的激烈的思想论争已迫在眉睫、“不容辞却”。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的斗争中而不断传播深入,并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

“五四”之际是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均被当作新思潮介绍到中国。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波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问题与主义”(1919)、“社会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1920)及“无政府主义”(1920)这三次大的论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几次大论战就其本身意义及产生影响而言,已远远超出一般的学术问题探讨的范畴,而是“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上的争辩”<sup>①</sup>。其所涉及的诸如中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等问题,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因此,文化选择的冲突也就相应具有历史抉择的意味,而人们也正是在辩论的过程中凝聚了对真理的共识。事实上,正是借助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与流派的深入批判,才使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从而使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寻求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的彻底解决,而这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论战,唯物史观战胜了唯心史观,这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如果说通过三次大的论战,唯物史观战胜了各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从而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方向的话,那么通过“人生观”的论战(1923),马克思主义则在哲学上战胜了两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流派,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两个哲学流派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的唯一意志论。这是两个在“五四”之际影响很大的流派,“科玄之争”的科学派与玄学派即为二者在中国的代表。尽管两派在人生观问题上南辕北辙,却共视唯物史观为冰炭二途。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生观,有力地驳斥了两派的观点,指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和支配人生观;人们只有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律才能使行动更符合实际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既反对了科学派所宣扬的非决定论,也驳斥了玄学派将唯物史观说成是宿命论的诬蔑。

如何才能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这不仅需要提高理性认识(“知”),而且需要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去(“行”),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

<sup>①</sup>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界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通过这次论战表明:马克思主义与群众实践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过程不是自发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使群众斗争由“自发”变为“自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sup>①</sup>。而这实际上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现实发展的方向。几次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潮、哲学派别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如20世纪30年代还发生了三次大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辩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讨论。这些论争应当说涉及面极广,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发展规律到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可以说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各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转型和哲学革命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不同层面的讨论与论战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高潮,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与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成熟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论战促进了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由此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开始进入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哲学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主要表现在革命阵营内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群众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在反对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基础上,逐渐地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包括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右倾错误往往表现为相对主义和折中主义,只讲矛盾调和而忽视斗争,强调客观条件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而与此相反,“左”倾错误则往往表现为独断论,只讲斗争哲学而忽视统一,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条件。这就是“左”右倾错误的实质与根源。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的见解。因此,它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sup>①</sup>也正是在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sup>②</sup>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③</sup>的口号,进而把历史经验的总结提高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由此战胜了包括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这个思想大敌,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这不仅帮助我们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道路,而其本身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必然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哲学为群众所掌握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标志与成果便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中国近代哲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由毛泽东作了历史的总结。”<sup>④</sup>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之所以能达到历史的总结,首先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科学的总结。”<sup>⑤</sup>此中,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概括,它既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并且贯穿于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依据“具有民族形式”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彻执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科学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

---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④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2页。

⑤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页。

时代中心问题,科学地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即在政治上,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文化上,既反对食古不化,也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建立“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和“大众的”(方向)文化。<sup>①</sup>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一今古中西之争的实质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新民主主义论》(1940)等著作中作了科学的回答。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的回答是正确的,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代表了中国现代社会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在1948年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革命是要“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sup>②</sup>。这段话,正确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当时对民族复兴内容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基本事实。对此,毛泽东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诗一般的语言激情四溢地描述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sup>③</sup>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④</sup>。其与中国实际(包括优秀文化传统)的正确结合,不仅对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知行观作出了科学的总结,从而取得了“民族的形式”(即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民族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的风格),标志着统一的世界哲学史的开始;而且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也作出了科学的解答,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发展而为群众性运动,再进而发展成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典范,是“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sup>①</sup>;“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sup>②</sup>;“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sup>③</sup>。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对它们做出了新的发展。对此,邓小平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sup>④</sup>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纪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由此,实际上也就开启了“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sup>⑤</sup>的新时代。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而马克思主义要显示其无比巨大的力量,“就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